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九三期 ——
(二〇〇四年九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9a)

【史海钩沉】《横扫》出笼日 灾难降临时 ——人民日报“六·一社论”出笼前后	余焕椿
【历史标本】“焚琴煮鹤”诗案——老诗人邓均吾之死	甘 犁
【历史资料】罗广斌、杨益言“文化大革命”初期给中共重庆市委的报告 《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志在“一二·四”血案控诉大会上的发言	
【人物春秋】作家刘德彬在“文革”中	何 蜀
【亡灵祭坛】复旦大学已调查到的文革死亡记录	佚 名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横扫》出笼日 灾难降临时——人民日报“六·一社论”出笼前后

• 余焕椿 •

(一)

自从1965年11月1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人民日报就一直在揣摸上海“气候”和观察吴冷西的行为、举止和情绪中过日子。

编辑部派出多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四出活动，观察动向，刺探消息，重点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获甚微，这两个地方对人民日报似有防范和警惕，滴水不漏；有时觅得一点蛛丝马迹，又往往凭主观愿望推断，得出错误结论。

吴冷西仍同往常一样，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他有时突然召开编委会，有时从钓鱼台打个电话过来，传达一点中央精神，每一次这样的举动都在编辑部引起不同凡响：有人说“中央

还是信任他的”，也有人说“吴冷西是故作镇静”，其实，谁也把握不准。

这个时候，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段时间对人民日报——实际上是对中央第一线领导的不满，给此报设置陷阱：遇事撇开《人民日报》。一切重要文章先在别的报上发表，重大决策对报社封锁。因为这样，人民日报社一度对政治动向不摸底，对中央领导意图不清楚，处境十分艰难”。（穆欣《劫后长忆》第99页）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统一部署，署名高炬、何明的文章，把主要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明攻“三家村”，实攻彭真和北京市委。

这两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口气很大，调门很高，充满杀机，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们，一定不放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睛，辨明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诬蔑《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两天后，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宣称《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荡“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北京、上海舆论同时发起对“三家村”的猛烈攻击，显然是在配合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对彭真等的批判。而挖“最深的根子”的意图也就不言而喻了。以往，像这样的重大举动，总是《人民日报》先发社论或文章，其它报纸转载。现在颠倒过来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其它报纸的文章和社论。这种怪现象，使编辑部大多数人感到吴冷西大势已去，《人民日报》已被“开除出局”，党中央机关报的地位已不复存在。

（二）

面对这种局面，报社人员开始分化，纷纷起来贴大字报，揭发问题，敦促吴冷西作检查。编委会和党委会主要领导仍抱幻想，同群众对立。他们紧锣密鼓地召开各种会议，组织队伍，统一思想，施加压力，搞起所谓“民主运动”，准备抓右派，目的自然是保吴冷西。1966年5月18日，陈伯达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批评人民日报一潭死水，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消息一传出，更加速了人民日报内部的分化。

领导层方面，继续保吴冷西，出了一个有名的“保旗论”，胡绩伟说：“吴冷西是一面旗帜，人民日报在风雨飘摇中要同舟共济，保护这面旗帜。”党委会则积极组织抓右派，策划“民主运

动”，提出要抓“四条黑线”：彭真黑线；邓拓黑线；中宣部黑线；资产阶级思想黑线。他们玩“引蛇出洞”老一套花招，估计“民主”一运动起来，有人就要说话，就要行动，那时“黑线就自然出来了”。

群众方面，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有的大字报除了批评吴冷西外，还批评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指出编委会中有人不揭发吴冷西，反而散布揭发吴冷西的人的流言蜚语，责问这里有没有阴谋，“如果确有策划这种阴谋的人还站在领导运动的岗位上，就请求中央撤换他们，不让他们在斗争中挡道”。

人民日报这潭“死水”动起来了。陈伯达感到高兴，说“大字报好，是教育自己、教育编辑部同志们的很好的工具”。他提出要批判“保旗论”，并根据大字报点名的情况，提出人民日报有一个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四大家族，鼓动人们起来把他们打倒。

陈伯达要把“死水”搞成“活水”，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夺权。所以，陈伯达要继续对吴冷西施加压力，直到把他压垮。此时，陈伯达已拥有很大权力，能够为自己制造一次次机会，搞得吴冷西寝食难安。

1966年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陈伯达当众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大权。

5月23日，陈伯达又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

5月31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劫后长忆》第104—105页）

当天下午，中央在怀仁堂召开北京各报刊负责人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邓小平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党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他一面批评人民日报，一面又鼓励吴冷西振作精神，好好工作。邓小平说，“人民日报跟北京日报不一样，不要自己把自己置于同北京日报一样的位置”。“北京日报出了问题好办，是北京市委出了问题；人民日报出了问题怎么办？是中央出了问题”。“首都各新闻单位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还说，人民日报的大字报乱哄哄的，以后只能在几间小屋子里面贴。

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全都出席了怀仁堂会议：他们当中一些人受邓小平讲话鼓舞，兴奋异常，主动讨好吴冷西。W说，“你看吧，那些写大字报的都要缩回去了”。X则表示，“幸好我只发了一次言，只写了一张大字报，差一点上当了”。他们只知道邓小平在讲话中保了吴冷西，可是他们怎能知道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呢？

1966年5月31日晚，人民日报部门以上干部在三楼会议室已坐等多时，大家相对无言，默默地静候中央工作组的到来。

6时左右，工作组组长陈伯达带领王力、关锋、穆欣以及其他工作组成员和“记者团”来到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让吴冷西停职反省，并把他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斗，让印刷厂工人把大字报贴到编辑部楼道上来。陈伯达说：“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原来的领导不得插手。各部门领导也要调整，按巴黎公社原则推选新的负责人，我们不包办，但要报工作组批准。”吴冷西要发言，刚讲两句，就被陈伯达打断了。

这时，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胡痴也赶到报社同工作组汇合。当天下午，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新闻界宣布人民日报工作组名单中并无唐平铸和胡痴名字，他们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两个“特殊人物”的到来，立刻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相信这是陈伯达的刻意安排，他需要有懂得办报又与军方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来协助他接管人民日报。从5月31日起，唐、胡二人天天夜里来人民日报上班，深得陈伯达的赏识和器重。

后来唐平铸当上人民日报代总编，胡痴当上新华社代社长都仰赖于陈伯达的举荐。唐平铸当上代总编后，在办公室里贴过两张陈伯达亲笔书赠的条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高名之家，鬼于其室。”据说陈伯达也送过一张条幅给胡痴，上曰：“伯达不达，胡痴不痴。”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陈伯达一举一动，无不显示出他与几个小时前邓小平讲的话针锋相对。其用意无非是要向报社传递这样的信息：邓小平救不了吴冷西。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从此陷落了。

（三）

报社夜班工作主要在二楼，总编辑办公室、总编室、评论部、值班室等都集中在那里。事前，报社已为工作组人员腾出了两间大办公室，一间更大些的是总编辑吴冷西的，另一间小一点的是副总编辑胡绩伟的。不知何故，陈伯达不进吴冷西那间，选择了小的。10几个参与社论修改、定稿的人扎在一起，显得有些拥挤。工作组另外的一些人，则在大办公室里审阅第二天见报的新闻、文章和版面。

从表面看，人民日报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内部反而显得异常平静，除了二楼走廊上多了几个陌生人影，工作气氛比往日紧张、压抑外，并无什么特别变化。自从《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苦撑了半年多，现在终于从迷惘、困惑和彷徨中清醒过来：批《海瑞罢官》并非学术问题，而是一场严重的权力斗争。

“六．一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前所未有的口气和煽动性宣示了这一点：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这篇社论是5月31日下午，中央向新闻界宣布中央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前几个小时，陈伯达在钓鱼台授意钱抵千、尚力科和朱悦鹏起草的。陈伯达对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陈伯达还说，“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明天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

起草工作很顺利，上午接受任务，下午动笔，晚上起草人就将初稿带到了人民日报，等候修改。据朱悦鹏说，他们三人根据陈伯达口述整理、编撰成文。起草过程中，钱抵千特地加进了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关于政权、政变的一段话。钱抵千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和康生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于是，社论第四个自然段，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林彪的讲话”。（《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下721—723页）

参加修改社论的有王力、关锋、唐平铸和胡痴，陈伯达最后定稿。社论内容都是陈伯达和林彪的话，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只在题目上兜圈子，或许陈伯达心中早有打算，在那里故弄玄虚。社论原题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在另外一张纸上写了好几个题目，最后他自己圈定了其中的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就这样，社论大功告成。排版前，陈伯达特别吩咐，社论要排楷体字，题目要做通栏，位置要放头版最上方。这是陈伯达夺了吴冷西权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旗帜鲜明”的“得意之作”。他的阴险和毒辣就在于：第一，将《5.16通知》和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以党中央机关报社论的形式散布出去，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第二，号召大家起来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置全国于白色恐怖之中。

但是，使他始料不及的是，社论刚一发表，编辑部就接到无数抗议和批判的电话，直斥炮制社论的人是牛鬼蛇神，惟恐天下不乱。很快，批驳社论的信函接踵而至，有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逐段批驳，称社论是株真正的大毒草。此信不是来自别的地方，恰恰来自陈伯达要亲自控制的舆论机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使他有点恐慌，感到舆论阵地内部不稳，于是，他带着工作组的人，到新华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召开大会，鼓动人们起来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军队中调干部，以记者名义到中央三大新闻单位去掌握情况，以便牢牢控制。

尽管有抵抗的声音，但太弱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毒素，还是像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开来，噬蚀灵魂，摧残生命，造成难以估量的恶果。

人民日报在“文革”中算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单位，从未发生过武斗。8月24日，人民日报突然掀起了一阵揪斗“牛鬼蛇神”的狂风恶浪，吴冷西等一批“走资派”被揪到五楼大礼堂，“造反派”强迫他们跪在台上，围着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此时已被调到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也名列其中。“笑雨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

唇紧闭，到了办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楼。他回到三里河华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将手提包塞进宿舍铁门，就回身到玉渊潭，让清澈的河水陪伴他离开那个混乱污浊的人世。”（《人民日报回忆录》336页）

同一天，现代中国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老舍，在腥风血雨中自沉太平湖。7月间，老舍在上海还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可这一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谁也躲不过这场劫难。

8月23日，北京市文化界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中国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等三十多人，连同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和道具，被红卫兵一起装车拉到了国子监。在一块空地上，红卫兵一边焚烧戏装，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拷打顶着烈日跪在火堆前被他们当作“牛鬼蛇神”的作家。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块戏装上的白绸水袖替他包扎，并离开现场。

回到文联，老舍又被另一支几百人的红卫兵揪到文联大门外水泥花坛丘示众，拳头伴着口号，皮带夹着唾沫，又乱揍一顿。后转移到当地派出所，那里又有红卫兵轮番打他，一直折腾到深夜，并命令他第二天必须自己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报到，接受批斗。

第二天即8月24日一早，老舍独自离家出去了。行前，他拉着三岁孙女的小手说：“和爷爷说再见。”然后径直到了城北的太平湖，就再也没有回来。

也是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哲学家李达在武汉逝世。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李达成了武汉大学第一个牺牲品。红卫兵在他家屋里屋外贴满了大字报，专门安装高音喇叭对着他家不停吼叫，还组织队伍绕他家游行示威，随时被揪出去批斗。这样闹腾了70多天，8月13日他的胃大出血，红卫兵不准他去医院就诊。9天后他晕倒了，才被送进医院。他妻子抓住救护车门，要求跟去护理，却被红卫兵打了下去。

8月24日夜里，病痛使李达滚到床下，死时身边连一个人都没有。

这里仅仅是8月24日一天的几个例子，谁说得清楚，“横扫”以来，有多少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被打死、被摧残致死、被逼自杀身亡！

具有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起草和修改社论的人，后来几乎无一例外都成了“牛鬼蛇神”，包括陈伯达自己。有鉴于此，陈伯达后来“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陈伯达传》下4—28页）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审判员问：“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你组织人写的吗？”陈伯达回答说：“我写的，是我写的。我写的不在于我拿笔写不拿笔写，我口述，我口述的。”“这篇文章的全部责任，全部，不是一部分的责任，我都要负担起来。”甚至说：“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了。”

当人们后来谈起“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何时算起时，自然想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不是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算起，虽然毛泽东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之日算起，虽然提出“文革”政治纲领，向全党发出开展“文革”号召是从《516通知》公布之日开始的。在人们心中，“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开始的，虽然没有最高指示和红头文件为根据，但是

灾难降临之日就是《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中华大地变得混乱污浊和没有理性，也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六·一”社论是块界标，《人民日报》从此为自己“横扫”出了一条罪恶之路，领导舆论，一步步走向深渊，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才获新生。

□ 原载《同舟共进》2004年第6期

~~~~~

# 【历史标本】

## “焚琴煮鹤”诗案——老诗人邓均吾之死

• 甘 犁 •

老干长条倚碧霄，  
虬髯红拂入挥毫。  
金城柳是英雄种，  
岂向西风一折腰。

这首绝句是老诗人邓均吾写的，题为《观人画柳》，刊载于1962年6月7日重庆《奔腾》文学双周刊第16期上。

请今天的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力，允许你不择手段，挖空心思，看能够用什么办法将这首诗打成“反诗”。

我这个过来人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要这样做，必须有一股“史无前例”的超强龙卷风，还得设置一个经年跨岁地不断扭曲人心、泯灭良知的社会背景。而这种使上亿人遭罪的劫难毕竟过去快四十年了。

如果把时光倒转至1966年的春夏之交，也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强颁硬贯的时候呢？那可就是头脚倒置之世了。一时大风起兮，摧城拔木，任何匪夷所思的事都能出现。重庆市文联，那时不过是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团体，邓均吾是备受文艺界尊重的老诗人，在这雷霆冰雹劈面袭来，文化人个个头上悬着一把大革文化命之剑的特殊时空下，他这首短短四句二十八字的小诗，经过推演，经过锻造，就骇然被打造成“反革命黑诗”了。邓老因此备受凌辱，以致在饱受折磨之后含恨以歿。对于重庆文学界来说，这一诗案，至今还是“了犹未了”的一桩冤案。

2003年的抗拒“非典”，是一场全民战争，即使疫患已除，专家们还在紧张地寻找疫源，研究并制定防范机制，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人民福祉，吸取教训，绝不可让疫情再次肆虐。而“文革”之灾却在人间为祟十年，据始作俑者言，隔段时间还会再爆发。那么，它是何种疫源、什么病理造成的？怎样才能防患于未然？十年浩劫，兹体事大，好像难以着手。但具体到小小重庆市文联中的小小诗案，兴许倒能比较容易说清原委。为了防止这一社会恶疫变性再甯，是不是可以剖析一个标本，为这曾经恶发的社会痼疾留下一块小小的病理切片呢。

## ◇ 诗本事

邓老这首题画诗，写于1962年壬寅虎岁的阳春3月。

1961至1962年之交，正是那场导致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的尾声。为了缓解灾情和总结教训，中共中央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开始检查过去的政策措施，着手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等偏失，对“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的一些干部、共产党员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从农业“十二条”开始，在文化和教育科技方面也拟制了一些纠偏规定，知识分子头上那顶戴了多年的“资产阶级”帽子也被周恩来和陈毅宣布摘掉，承认其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根据这样的精神，在这年春风骀荡的3月中，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在重庆开了个气氛宽松的座谈会，把一些知名画家请来雅聚。祝酒中，重庆市文联和四川美协领导人，对过去反“中、下游”，拔“灰、白旗”，伤害知识分子感情的作法，说了些宽慰的带甄别性的话。对国画这一画种受到冷落表示了歉意，并答应要为陈子庄、冯建吴这样的画家筹办画展。目的是为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大家心情舒畅地共渡时艰。

尽管过去几年中有过物资匮乏，也有过过火批判，但中国知识分子是很能顾全大局，很讲“忠恕”之道的。既然有文化方面的领导人主动致歉，那还不是在以国士待我，而由是感激吗？陈子庄先生就感动得流了热泪，并当场展纸挥毫，画了一幅“老干长条倚碧霄”的春柳图，借以表达他“律回岁转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的振奋心情。

邓均吾作为重庆市文联负责人，这次雅集也是主宾，看到陈子庄先画柳树老干，桩头上残桠戟立，能使人意识到过去的严冬之冷和人为的芟伐太过；继而见画家挥笔画出了柔条，用似有若无的绿色点舒了柳眼，顿时就感到了瑞气葱茏，整个画面充盈着不可阻遏的勃勃生机；宣纸上的大片留白，也因此透出了天高云淡的亮色。邓老不由诗兴就来了。“虬髯红拂入挥毫”，就是借用文学形象表达画面黑白相生、刚柔相济给他的审美感受。更重要的寄兴是在思想层面上，邓均吾是老共产党人，看到在困难形势下，执政党和知识分子如此的肝胆相照，由衷地感到高兴。当时宣传中强调困难形势与“帝修反”的干扰破坏有关，号召中国人民在“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面前要自力更生、发奋图强。陈子庄的壬寅春柳，不正是形象地体现了这种骨气和志气吗？“金城柳是英雄种，岂向西风一折腰”，就是对这种风骨的肯定和赞扬。那些年人人皆知“东风压倒西风”这一口号，“东风”与“西风”是有其具体的不容混淆的指向性的。

那次壬寅雅集中，陈子庄的画和邓均吾的诗，是重庆文艺界的一段佳话：从艺术活动看是这样，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看也是这样。

#### ◇ 诗祸

1962年春天的这股祥和之气，实在太过于短暂。由于“阶级斗争”大纛的高悬重祭，这年入秋，意识形态领域的气氛又乖戾起来。文艺界各团体被指斥成了“裴多菲俱乐部”，“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到了大革文化命的狂风乍起，根据那个由江青主持、据说含有最高旨意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过去一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艺运动，竟然被一条又长又黑又粗的“文艺黑线”专了政！按照这样的诛语，从北京的周扬到重庆的任白戈，全都在劫难逃，遑论重庆市文联中的作家、编辑。

风起之初，大约重庆市委也想不到自己竟会同各级党委一样变成“运动的重点”，在紧跟中也就一循旧规，先把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挑几个整了再说。派来整文联的工作组，是从市文化局和当时的“红旗单位”四川美协选调的。重庆文联和四川美协，是同一个党组领导。用一句俗话说，是同一根线上拴着的蚂蚱。但此时“文革”舞台上要他们扮演的角色是蜥蜴，自然也就迅速变色，本诸上命，把文联作为一条尾巴抛将出来，让它在大张挞伐中去蹦跳；以使更加重要的首脑部分得以逃到避风处，争得一些应对时间。

也不知这该叫悲剧还是喜剧，原来熟得不能再熟的文朋画友，在这“煮豆燃萁”开锅之前



竟然变得来形同路人。工作组来到文联，也要像农村“四清”那样搞“扎根串连”，寻访“苦主”，然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开“见面会”，号召拿起笔做刀枪，锄毒草，挖黑帮。既然长期以来被“黑线”专了政，文联中人除极个别外，几乎全都入了黑籍，负有原罪。所谓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形式的互查互揭，实际就是吠形吠影的互咬互噬。被指定入棚搞大批判的文联礼堂，天天腥气扑鼻，人人刺刀见红。角斗士们此时私心最为害怕的，是在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混战中不要被圈定；一旦被圈，那就会百矢集身，被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无数只脚了！

横祸就降临到了邓均吾头上。

邓均吾，又名邓成均，笔名默声、微中，1898年出生于四川古蔺。他是我国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和浅草社的老诗人，文学翻译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就在上海投身新文学运动，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同编《创造》，发表了《白鸥》等新诗，出版了编、译书籍多部。抗战军兴，他在成都从事抗敌文协工作，协助车耀先编辑《大声》，1938年经周文、赵其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教育、新闻等职业掩护下进行革命活动，曾任古蔺地下党县委书记。50—60年代，历任重庆市文联秘书长、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奔腾》和《红岩》主编，并长期兼任重庆文史馆馆长。

邓老在重庆文学界资深望重，虽然是重庆市文联唯一的副主席（西南文联撤销后，因重庆未开文代会，尚未选出主席和其他副主席），荣誉性却大于实质性，并不实际主事。无奈这场文化杀戮需要靶子，“文革”祭坛需要牺牲，从“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说，他是创造社时期的诗人；从民主革命说，他是抗战初起时的共产党人；从当权派说，他有领导人的名义。在成都已将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亚群、省文联主席沙汀“揪出来”点名批判的情况下，重庆不揪出个文联负责人能交得了差吗？因此工作组一进文联，就将邓均吾列入另册，只嘱他将诗稿交出供大家检查，不让和“群众”一起“学习”。这不明摆着是树的草垛吗？

在“疑义相与析”的号召中，诸如此类的大字报就出来了一一邓老诗句中，“青年党领导”被断句为“青年党 / 领导”（竟想让“青年党”来领导，何等反动）；“家家办得好公粮”被分析为歌颂单干（为何不写“队队办得好公粮”），形容村景的诗句用了“武陵”或“桃源”这样的词汇，更是被上纲成为对现实不满，恶毒影射新社会是“暴秦统治”……

尽管揭批者说得血泡子翻翻，满嘴是毛，但从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工作组看来，还是没有抓住要害，难以取得战果，便鼓励继续深揭狠挖。

重庆市文联作家群中，恰好有两位特殊人物，他们在重庆解放前夕有过坐牢的经历，重庆一解放，他们就开始写作控诉国民党集中营关押、刑讯、屠杀政治犯的文章，以后便一直按组织的安排向青少年作宣传讲演，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受命写作，并从纪实之作转为文学创作，终于在有关组织部门、文学大师和出版单位的鼎力扶持、帮助下，于1962年出版了引起轰动效应的“党史小说”，他们也因此被组织调入重庆市文联。成为专业“创作员”（指《红岩》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编者）。在文联环境中，他们更表现出党务工作者的干练和政治警觉性。还在“文革”酝酿之时，他们就得到江青的“亲切接见”和关照，还曾在狠批“文艺黑线”时被用作雷击夏衍等“修正主义分子”的石头。他们回到重庆后，开口闭口“江青同志”如何如何，“文艺战线”怎样怎样。因为得风气之先，“文革”一开始，他们就闻风而动，以“左派作家”的姿态，在文联公开提出：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奔腾》上毒草占40%，存在“黑线专政”问题，必须严加追查。

不过，他们也有些不虞之灾的顾虑。因为在他们那部小说成书过程中，一直受到重庆市委特别是组织部门的支持，也多方得到文艺界前辈的扶掖帮助，而有关的领导干部和作家，在“文

革”前夕和“文革”风暴初起时竟纷纷落马成了“反党分子”、“黑帮”，这很有些使他们紧张，不得不写出大字报和“揭发材料”，以便“划清界限”。既然对周扬、夏衍、任白戈、沙汀、马识途、萧泽宽等都可以抹下脸来“反戈一击”，又何吝于对30年代的老诗人下狠手呢？

因而，工作组一号召，他们就冲杀上前了。在他们看来，陈子庄的画和邓均吾的诗，出笼于1962年春，其中必有微言大义。用这种政治眼光作刀，他们一下就从诗的第三句中解剖出了反骨。原来，“金城柳”出典于桓温，桓温是东晋时带兵之帅，他在西征北上途中看到当年种的柳树已经成围，而他统一中国的功业尚未实现，不禁泫然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将东晋时的桓大将军拿来和今天的现实一加比附，不是也有一个转战大西北的彭大将军吗？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被定成了“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头子，1962年，正是被伟大领袖认定有人大刮“翻案风”、“黑暗风”的时候，恰在这时，陈子庄画老干新枝，邓均吾的诗写“金城柳是英雄种”，不正是与彭德怀翻案之心暗通而遥作呼应吗？

这样的上纲批判，因符合运动的期求目标，工作组听来就有些味道了，稍加鼓励。“左派作家”又在邓诗的第二句上有了突破性发现：“虬髯红拂入挥毫”，所写何人何事？据唐人传奇，原来隋末大乱，在群雄中有位虬髯客，想与李世民争天下而没有得手，只好去海外称王，退出争夺前曾与李靖、红拂谈过：“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在1949年争天下失败而被赶下海的不是蒋介石吗？台湾正好距北京数千里，蒋介石正是在1961、1962年之交叫嚣反攻大陆，不正好与虬髯客所预言的“得事之秋”暗相契合吗？这就是要害。抓住这个要害来个顺藤摸瓜，竟然发现陈子庄曾在军阀王缙绪那儿当过幕宾，教他家的孩子画画。虽然陈子庄在成都解放时对王缙绪作过策反，使其脱离了蒋介石集团，但王缙绪又在1957年越境外逃时被抓，这难道会是偶然现象吗？根据这样的政治投影，陈子庄在解放前的身份就颇可疑，他在1962年所画权桠森然的老柳就更可疑。现在又有了邓均吾的诗来点题，这不是在公开为蒋介石反攻大陆作舆论准备吗？在“左派作家”的揭发中，还把蒋介石是在1962年某月某日叫嚣“反攻大陆”，邓均吾是在几天之后抛出“反诗”，详加对照，说得清楚而又具体。“黑画反诗”也就如此这般地“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了。

请不要以为这是热昏发烧者的谰语。把全国几亿人都发动起来搞“文革”是为的什么？《五一六通知》说得明白，是为了把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揪出来，这是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边……根据这样的大方向，工作组就对如此破译邓诗予以采信，还在对第二、三句诗的穿凿附会基础上，对第四句作了顺理成章的上纲：大陆正在台湾之西，“岂向西风一折腰”，也就是讴歌蒋介石的反共顽固性！

邓老在缺席审判中，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捆在可讨可诛的示众桩上了。

“文革”运动果真是史无前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重庆市文联这边还昏天黑地，人心惶惶，不知何时风头一转，领导运动的工作组忽又变成了批判对象。受过江青亲炙的两位“左派作家”，赶紧宣称受到了工作组的“迫害”，戴上红袖笼，扯旗造反，组织起重庆“文联红卫兵战斗组”，夺了文联的大权，建立起号称重庆市第一个“文革”新政权——“文联文革小组”。他们不但在文联狠批工作组，还把工作组拉到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去“辩论”。在批判和“辩论”中大肆张扬他们与“江青同志”特殊而又神秘的关系，认定重庆“黑市委”对他们的态度反映着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控诉市委通过工作组整了他们的“黑材料”，目的则是“把矛头指向江青同志甚至更高”……

为了逼迫他们所说的“黑材料”，他们不但揪斗工作组成员，还多次组织造反人马到重庆市委机关和党校等单位进行查抄，然而他们并没有抄到所谓工作组整他们的“黑材料”，倒是在市委宣传部抄到了工作组整邓均吾的上报材料。原来工作组已经按照《十六条》的分类，把邓老

定性为“四类”——必须打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了，“罪状”主要就是那首诗。

当这些“战果”被掳回文联后，文联的“棚友”们无不咋舌。邓老是文联这个团体中的松上鹤，园中芝。成仿吾称他为人真挚；郭沫若赞他诗品清醇；沙汀说他淡泊自甘，朴质谦虚。在文联这个运动不断、批判不断的团体中，他从来宅心仁厚，是公认的蔼然长者。重庆市文联关门揭批连续数月，邓老被批判的也就那几首小诗，早为吹毛求疵者梳篦过若干遍。在“文革”初期号召揭批中，有互相帮助“洗澡”的提法，究其实，只是互泼污水而已，尽管久而不觉其臭，也还没有到污黑大家眼睛的地步。因而看到了那份白纸黑字的打印上报材料，大家都不禁头皮发麻，深感后怕。

其时正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左派作家”口口声声说工作组整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整了他们的“黑材料”，“何其毒也”！这一下抄出了工作组整邓老的材料，不是正好坐实了他们的指控，正该大张旗鼓销毁“黑材料”、为邓老平反吗？殊不知造反有造反的逻辑。“左派作家”言必称“江青同志”，在文联造反、夺权时念的符咒主要是江青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是他们坚定不移的大方向。在他们眼里，重庆文联所办文学刊物《奔腾》上“毒草”占40%，主编邓均吾罪责难逃，何况又写有“反诗”，这样的“文艺黑线”人物岂能翻案？再说，邓均吾的“反诗”，又是经过他们的手眼而得以破解的，为邓均吾平反，会置他们于何地？于是，邓老不但得不到平反，又成了文联造反派的批斗对象。两位“左派作家”大讲重庆文艺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讲“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每讲则必以《奔腾》“毒草”和邓老“反诗”为例。由于这两位“左派作家”的知名度，重庆市起而造反的各路人马和来重庆串连的红卫兵，不少人都到文联来听过这样的报告宣讲，接受过这样的“路线教育”，油印的《重庆文联文革大事记》和《重庆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广为散发，从而使老诗人写“反诗”之说，在众口烁金中传播四方。

#### ◇ 诗殇

读过《双城记》的人都知道，在法国大革命中最为恐怖的是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并落于无政府状态中受暴民专政。因诗贾祸的邓老，“文革”中就长期困顿在这样的环境里。

以两位“左派作家”为首的重庆市文联“新生红色政权”成立之后，就宣布实行“红色恐怖”，在大门口贴有“黑帮”榜，“邓均吾”名列榜首，还在他家门上拉有横幅，写有罪状。那时，因两位“左派作家”带头造反，率先夺权，使得重庆市文联成了热点单位，来串连者，“取经”者，请“左派作家”题字签名留念者，每天络绎不绝，仅据“左派作家”自己的统计，在“文联文革小组”成立后的两个月内，他们就接见了来自各地的“革命小将”和各界革命群众5万多人。他们经常在文联院内安上高音喇叭向来访者作报告，大讲“黑线专政”和邓均吾的“反诗”。受了蛊惑的“革命闯将”们，总会有人闯上门去向邓均吾问罪，动辄挥舞铜头皮带，拳脚交加，在这七旬老人身上表现“革命义愤”。老诗人则无论如何也不接受那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罪名，他还写了两点声明：“1、外面的说我写《观人画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是接受不了的；2、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没有任何阴谋和活动。写了坏作品，是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结果。”这样的声明，必然遭到更加暴虐的凌辱。要知道，这可不是一时的冲击或三五天的黑暗，而是天天都有不测之祸啊！

重庆的乱世英雄们很快就因夺权而分裂，为夺权而武斗，在夺权与反夺权的内战中，地处入城咽喉部而又毫无保障的文联机关，也就成了各派“草头王”都想盘踞之地，无论是“黄天霸”派杀来，还是“窦尔敦”派杀来，总有一个例行仪式是少不了的，那就是把这个单位的当权派拉出来斗。邓老也就被轮番“祭旗”。到后来，文联沦为了一派盘踞的指挥中心和武斗队聚集地。老诗人自然就更加朝不虑夕，要频遭狼膏虎吻了。

记得是1967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我在沙坪坝公园附近碰到邓老和他的老伴周静芳老师。我向邓老透露了文联的党员业务干部在乱离中逃向了什么地方，还讲了“文革”前在文联实际当权、与邓老同样被打成“黑帮”的王觉秘书长住在什么地方，暗示他也该迁地避祸。周老师很焦心，邓老则只是神色肃穆而已。

以后局势进一步恶化，文联所在的两路口地区，两派对峙，哨卡密布，连对运米运煤的解放军都敢开枪，民命就更被视为蝼蚁。邓老有如脸刻金字的囚犯，真不知这无法无天的日子怎么能熬得出来！

邓老没有远引避祸，在我想来，除去客观原因——挪动无地之外，主观上还因他不仅是诗人，还是位哲人。越是重温邓老的诗，越是能使人憬悟到这一点。

邓老有位浅草社时期和地下党时期的知友陈翔鹤，两老都是恂恂然有君子之风的诚笃文人。陈翔老写了两篇历史小说，一为《陶渊明写〈挽歌〉》，一为《广陵散》，“文革”前竟在报刊上遭到了点名批判。邓老对这桩文案非常关注。陈翔老写的是魏晋之世，其时既出了曹操这样的枭雄，也出了司马氏父子那样的野心家，按照封建集权的逻辑，凡是有能力有见解的知识分子，若不为当道所用，必系怀有不同政见，属社会隐患。在雄猜之主眼中，早晚需诱而捕之，锄而去之。即使像陶渊明那样辞官种地，像嵇康那样还乡打铁，也得设毒眼盯着，不可轻易放过。在这样的黑暗政局和严密文网下，陶渊明就早早地写了《自祭文》和《挽歌》；嵇康则寄情于更加抽象的艺术形式——音乐，他常常深夜抚琴，却不肯把《广陵散》的曲谱传世。这两个正直的文化人，陶渊明是吟着“聊乘化以归尽”的诗句，于自祭后“托体于山阿”的；而嵇康则连这样的寂寞之死也未能得到，终于因一个朝中下来的莫须有罪名，被拘捕审查，从而人琴俱亡，成为千古扼腕的“广陵散”。

邓老在1962年还写有《读史杂感》组诗，其中一首写道：“权威能使是非淆，指鹿愚奸数赵高。堪笑趋炎珠履客，随声合噪若鸣蜩。”真像是为“文革”前批判陈翔老和“文革”中批判他的系列闹剧作的预言。陈翔老在“文革”中被批斗折磨死了，“全国山河一片红”，邓老要逃又能于何处苟全？东汉党锢之祸时的张俭，不是逃一路反而害苦了一路的亲朋好友吗？因而邓老在两派对立纷争的武斗期中，就一直呆在家里。据周老师讲，那时的邓老是镇日里不言不语，鹄形枯坐。邓老相貌清癯，瘦身广颡。文联的干部都将他比作屈原。邓老既沦于狂潮漩涡之中，显然也只能选择屈心抑志，忍尤攘垢的失语状态。诗案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打造出来的。现在困在大沼泽中，与其言而反辱，倒不如在心中默诵骚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以此保持精神的高洁，来熬过这样的浊世吧。

劫后听周老师讲，武斗期中的邓老与谁为邻？曰“雄狮”，曰“猛虎”……多是在“天下大乱”中异化，人性恶变了武斗狂徒。他们如饮迷药，经常狂啸着“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冲杀，自家甫才一二十岁的性命都不懂得珍惜，对别人的生命当然更视若草芥。莫说抓住了对方“俘虏”，即便看到了自己觉得不顺眼的人，也动辄威胁“放气、放血、下‘零件’”。他们在文联占山为王的生活，自然也极富草莽性。哪天抢到了罐头、生猪，哪天就是狂欢节。罐头上胡乱戳个眼眼，呷干了汁水就随地乱扔；生猪更是不须庖整，用钢钎捅死就连毛煮……要是一段时间里战果不丰，邓老之家就成为“小将”们的游猎场了。他们见啥拿啥，桌上莫说出现荤食，即使是豆瓣酱或泡咸菜，只要他们觉得可取，就逕行倒入自家的饭盅。邓老的子女有时冒险进入文联，给他带来一点熟食、水果。有天晚上，邓老在几坐中看到有只手偷伸入室，叭地把电灯关了，心想又是哪个小青年在恶作剧吧？尽管起坐艰难，他还是挣扎着去门边再把电灯开亮，这时才发现门内地地上有个网兜，他茫然四顾后问：“谁把网兜丢在这儿了？”周老师闻声，前来扶他，恨恨地说：“这是儿子才送来的水果，又被那些挨冷子的抢走了！”谁知邓老听到后竟说：

“他们不再公开搞打砸抢，要关了电灯才来拿广柑，拿了还把网兜丢回屋里来，说明这些小将天良未泯，仍然是还有戒惧心和羞耻心的吧。”

1948年，听说为印度争独立的甘地被暴徒刺杀了。邓老写过一首诗：“精神洁比芬陀利，我佛慈悲此化身。兽性横流残劫日，为人为爱作牺牲。”诗人是社会的良心。劫中的邓老，还在关心着武斗青年的可教性。他的爱心真是像圣雄甘地那样的博大啊！

邓老在大动乱中也并非绝对沉默。劫后传出了他写的两首诗，一是写于1967年的《酷热中答人问讯》，诗中有句为：“堪欣病骨能如石，未许灵台化作泥。”一是写于1968年4月的绝句：“嫩绿成深绿，初春接暮春。时间催物化，万古不曾停。”诗人的心还是不难揣度的。那就是不管怎样地抹黑、诬陷，他的心仍是关心民瘼，具有“忧乐先后”之念的灵台，并未化泥。“八表同昏魑魅舞”是一时之象，它无法扼阻时序与物化，终会酷暑转凉，“好将历史从头说，民意何曾尽可违。”

无奈邓老尽管自谓病骨如石，还是在内外交困中病倒了。邓老子女把老人抬进医院，医生检查后说：“这样重的病人应该马上住院。”但一听是文联的人就改口了，要文联的“红色政权”出具证明，说明病人不是什么“黑帮”、“走资派”才可收治。家属告诉院方，邓老从重庆解放起直至“文革”，一直是重庆市的人民代表。但这时连国家主席的命都保不住，谈这些还有什么用？于是就只能拖。邓老在政治迫害、精神折磨，肉体摧残，生活供给上得不到保障，生病又得不到医治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营养性的双脚水肿，在变色中渐渐地漫过脚踝，浸过膝盖……在遍地腥云，人命无法自保的日子里，周老师能向何方呼吁，能向何处求助呢？

诗人终于在1969年9月3日心身交瘁，人诗俱亡。邓老就这样用他的无声抗争，再演了一出山城文坛的“广陵散”。

#### ◇ 诗鉴

“文革”后期和“四人帮”倒台后的一段日子里，四川新都宝光寺有幅庙联在民间颇为流传，其联语是——

世上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邓老诗案，“文革”后好像就是这样不了了之地作了模糊处理的。要说没有拨乱反正吗？悼词中又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的话；要说平反了吗？邓老追悼会上对这诗案却回避未提。闹了好多年的大案，就这样囫圇吞枣般咽下去了。然而枣子好吞，枣核难消，它还在好些人心中钉着呢！

邓均吾和陈子庄都是蜀中文化界的名人，名人名案，并不那么容易含混得过去。因而即使文化界中人不说，文化界外却还有人记得，认为这场不白之冤未白。其中有个叫苗长江的钢铁厂厂长，他因为爱好文艺，曾去画家吴凡处串门，出于关心，问到了当年喧嚣一时的诗画案。1962年春天，吴凡正担任着美协四川分会的办公室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他其时也为知识分子境遇的改善和双百方针的贯彻而振奋，兴致勃勃地组织了那次画师之会，也当场看到了陈子庄的感激涕零和作画情景，当然也非常赞赏邓老的诗。他哪里会想到，四年后竟会来一场人妖颠倒，焚琴煮鹤！……这个厂长流着眼泪听后，就向吴凡索字，请他将《观人画柳》写成条幅，好为老诗人留一念向。

吴凡是年届八旬的老画家，我与他话旧中，听他感慨地谈到了当年的诗画案还有人记着的事，讲到他为供这位热心人选择，当时将回忆的诗写了两幅，还有一纸尚存篋中。我请他翻检出来，发现吴凡于忆录邓老诗后还写有一段跋语——

1963年四川美协聚会于重庆，画师陈子庄即席画柳，时老诗人邓均吾在座，后赋此诗寄兴。詎料文革中邓公竟因而被罗织成罪，备受荼毒。长江兄今言及此事，犹唏嘘不已。嘱忆录此诗，盖哀邓公之冤，亦鉴历史之谬也。

一九九八虎虎生气之年，春意盎然之月，天朗气清之日。吴凡书

如今提起“文革”，许多年轻人如闻天方夜谭，而许多过来人也有意无意地淡忘了。就拿邓老这首诗来说吧，吴凡忆录中，首句“老干长条倚碧霄”就错记为“老干新枝出碧霄”，诗画会的时间也记后了一年。有心人尚且出现记忆差错，若再往后，会不会当人们想作史鉴时，连起码的历史碎片都难找呢？

睹字思情，枣核未消的钉感又起来了。因而觉得“鉴历史之谬”这一课题似未完成，一个地方要出了交通事故，交通管制部门就得赶紧出现场，对事故车拍照，请目击者出证词，认真查找肇事原因，从而才可以警戒后车不蹈覆辙。1966年的诗画案，是在天下大乱时发生的。鉴这样的大乱，不提向社会，使后来者警觉，能知殷鉴之不远，能弭祸于未发吗？

1946年，邓老有首《自题》诗是这么写的：“生来不具奴性，自审亦非英雄。收拾万千矛盾，将来做个沉钟。”温读邓老的这些诗句，不由就想起浩劫后坚持写《随感录》的巴金老人来。他倡议成立“文革博物馆”，如一时成立不了，至少过来人也要学会说真话。坚持说真话。巴金是这么说的：“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往事聚在一起，将铸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我还联想及于周扬。

三折肱而成良医。拿“文革”重灾区文艺界来说，折肱者多矣，总该有人会成良医吧？比如周扬就曾经显得可以成为这样的大夫。一方面，“文革”前的历次文化大批判，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无不与他有关；另一方面，他又“木匠戴枷”，被更左的“文革”投入狱中，受了多年缧绁之灾。前后比较，推己及人，他就不仅知痛，还在痛定思痛中作了认真反思。“文革”后，他沉痛检讨，主动去一些受害文化人前认错，还努力把文化上的过火批判如何恶变至于为“文革”，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作了理性的再思索。从而他不仅获得了广大文艺界人士的谅解，还在拨乱反正中得到了人们新的尊重。不过，他试图医治“文革”沉疴的努力，似乎也并不顺遂。比如1980年中，有位留学生问他：“今后还会发生整人的事吗？”周扬的回答就一语三折，耐人寻味。他先是断然地说：“那不会了。”紧接着又补充：“起码我是不会那样做了。”停一下又再次补充说：“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不那样做。”（李子云《探病中周扬》）

趁还记得，讲讲重庆文联那曾轰传一时的诗画案，想也不为多事。正视史鉴的人多了，当年周扬答问的第三点，兴许能理所当然地变成第一点吧？至少，真实的材料积累得多了，那铜钟就会早些时日铸成的。

~~~~~

【历史资料】

◇ 罗广斌、杨益言“文化大革命”初期给中共重庆市委的报告

（衔略）

市文联是市里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问题不少，性质严重。所办《奔腾》双周刊，据前三十期的粗略统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约占40%，这不是小问题，有关领导干部是有严重责任的。文联和美协是一个党组，党组书记李少言，委员有牛文、王觉、邓均吾、吕亮，李、牛平时很少过问文联工作，文联的主要领导是邓均吾、王觉。邓是副主席兼《奔腾》主编，问题严重；但邓年纪大了（近七十岁），很少过问机关日常工作，许多事情多不经过他。王觉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兼（文联）秘书长，实际上掌握机关大权。机关多数同志认为王觉的责任和问题比邓严重得多，我们也是这个看法。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王觉等人竭力抵制，斗争很尖锐。按照党的教导，我们是共产党员，应该挺身而出，保卫党的革命事业，因此在四月份便和王觉等人有斗争。五月份我们就最先指出《奔腾》有方向路线问题，应该检查（我们的发言全都有文联的正式记录可查）。从此，我们便受到长期压制，直到今天已经有半年之久。许多党内报告和文件都不能听，不能看；并有机要秘书（支部委员）出面秘密地搞“单线联系”，在一些干部和全体工人中布置写我们的大字报，说：“王处长到市委宣传部开会回来，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的问题很大！没有大问题就揭生活方面的”等，这样组织了几张向我们提意见的大字报。很明显，这完全是转移斗争目标的手段。

6月13日，牛文同志以市委工作组（市委宣传部派出的）身份到文联领导运动，指定党组成员吕亮同志主持机关工作，我们即向牛文、吕亮汇报了我们的看法，指出《奔腾》是机关问题的核心，存在着黑线专政的问题，应该检查刊物，弄清问题。接着，我们在机关的大会上首先揭发了刊物和领导上的问题，态度鲜明，斗争坚决。同志们也纷纷揭露了许多问题，并揭发出如何布置写我们的大字报等转移斗争目标的事实。

工作组对王觉等人抗拒运动、转移斗争目标等活动并未追究，相反地，过了不久，我们便看出有包庇王觉的若干迹象。后来我们听说邓的问题凭两首诗已经定性，王却至今定不下来，这是很不正常的，和群众的看法有很大距离。王觉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难道一点问题也没有吗？可是我们从未听说市委宣传部特别是文艺处的同志揭发过王觉什么问题。我们对此是有怀疑的，对工作组的领导也不能不产生怀疑。

突然，7月22日深夜，牛文、××找罗单独谈话，简单地说了两点：一是“你们三人揭发沙汀、马识途、萧泽宽的材料和你们与他们的接触不相称。”二是要我们立即把1964年到南京档案馆等了解敌特材料的记录本交出来（我们为创作《红岩》前续而去了解有关材料，都是按照手续办理的），并马上派工作组人员到罗家接受罗的有关材料和笔记本，收走的东西比牛文讲的要多得多。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的搜查。接着，对杨、刘也作了变相搜查，把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如吴玉章、南汉宸、钱瑛、王维舟等）对我们讲的材料都搜去了。江青同志和我们谈话的记录也搜去了。一共搜去我们的笔记本和材料50多册。

之后，便是不让我们参加某些会议，甚至叫我们和摘帽右派等人听政策传达。对这样的遭遇，我们两点看法：一、组织上如果认为有什么问题需要对我们进行审查，我们完全接受，并且愿意尽最大努力协助组织清理问题，对党负责，也对自己负责。但从7月22日至今，已经两个多月了，除了我们写过材料外，工作组从未对我谈此事，也没有揭发过什么材料。二、我们认为自己根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更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我们写的作品中没有毒草，一篇也没有；2.我们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3.我们没有担任任何党

政职务，我们都只是创作员；4.我们认识的人确实有一些现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但是我们和这些反动分子根本没有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关系。我们写作《红岩》时，是组织部口管的干部，萧泽宽是当时市委组织部部长，所以管我们的工作；找沙汀看稿子，是组织上叫去的。马识途是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所以找过他对小说提意见；在《红岩》写作过程中，提过意见的人很多，我们对各种意见，都是经过独立思考，努力按照毛泽东思想来写的。现在可能有人想从《红岩》的写作中来抓点什么辫子，我们认为这种企图必须加以揭穿；5.我们为写作而进行收集材料也是完全正常的事，在写作《红岩》期间，我们不但查阅和抄录敌特档案材料，而且也多次提审过特务，难道这能构成干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么？那么，搜查并拿去50多册笔记本和材料，至今也不退回，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不能不怀疑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迫害。不能不怀疑有人想让我们背上包袱，束缚住手脚，不敢再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并在群众中孤立我们。甚至我们不能不怀疑出现八届十一中全会指出的那种情况：“包庇右派分子，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斗争更加尖锐。8月底，我们听了传达李井泉同志的讲话，我们对市委提了几点意见，主要是：1.井泉同志所说的四条禁令，直到现在也查不清楚。我们认为市委有责任帮助上级党委查清此事。没有规定就是没有规定，规定了就是规定了；2.对于揭发市委的问题，市委规定三天揭发，两天辩论，时间太短，希望延长；3.市委布置的辩论题目：“市委是不是黑帮？”我们觉得不应该辩论这样的题目，因为95%的领导和干部是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人。我们提了意见本来是好事，可是有人认为我们有反党情绪，对我们更加仇视。

接着，机关全体工人（厨工、勤杂等共五人）成立红卫兵战斗组，工人同志主动发展我们（过去我们和工人没有接触，更未在工人中进行活动），我们觉得这些工人同志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很好，工人对我们也经过长期观察，认为我们可以信赖，因此我们便参加了以工人为主的红卫兵战斗组。从此我们就更加成为危险人物，更加受到孤立了。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同志主动与我们接近，真正孤立的并不是我们。在运动中我们目标明确，从未离开过运动的大方向：“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有些人离开了运动的大方向，因而有些在运动中暴露出相当严重问题的人，现在忽然活跃起来了。这决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我们长期被封锁，不了解情况，只能在心里怀疑：到底是机关领导？是工作组？还是工作组之上的领导同志对我们采取了错误的对待？总之，领导上怀疑我们，工人同志相信我们，群众靠拢我们，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到底算反革命的右派？还是算革命的左派？

许多情况是我们无法查明的。因此，我们特将以上情况直接向市委书记处汇报。我们提出的不仅是我们几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路线问题，我们说的当然只是一面之词。但是我们衷心地相信党，殷切地希望并且相信领导上完全能够了解和解决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建议：市文联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问题虽多，但机关不大，全部职工不到三十人。如果领导上深入基层，把它作为一只“麻雀”来亲自解剖一下，是能够提供不少感性知识的，对指导文艺界革命运动，可能是有好处的。

以上报告，不当之处请领导上批评。我们衷心地期待着市委书记处查明情况，并给我们以必要的指示。

罗广斌 杨益言

1966年10月6日

◇ 《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志在“一二·四”血案控诉大会上的发言

（按：1966年12月4日，在重庆市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大规模武斗，被称为“保守派”的重庆工人纠察队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造反派强行冲击会场造反，引发激烈冲突，伤者无数。当时即有传言称“工纠”打死了造反派。次日造反派在体育场召开了控诉大会，罗广斌作了重点发言，他在这个发言中所提到的“昨天就在这里牺牲的革命先烈”，事后经多方（包括造反派自己）调查证实是不存在的。）

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十七年前牺牲的先烈，是为祖国的解放，为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而牺牲在美蒋反动派的屠刀下！昨天，就在这里牺牲的革命先烈，是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庆市委所屠杀的。烈士的英名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上，英雄的业绩将记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史册！在此，我们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对死难烈士致以沉痛的悼念，对英勇负伤的红卫兵战士和革命群众，致以革命的慰问。

毛主席党中央早已三令五申，要反动路线的执行人改邪归正。但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庆市委，一贯与党对抗，与革命人民对抗。叫他们放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不放弃；叫他们交出黑材料，他们不交；叫他们给革命群众平反，他们不平反！他们阴一套，阳一套，实行白色恐怖，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何其毒也！这种情况，我们绝对不能容忍！

我们呼吁：全市革命人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保卫英雄的红卫兵，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红卫兵的一切革命行动！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紧急行动起来，和革命群众一起，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把中国革命、世界革命推向新的高峰！

打倒反动的重庆市委！解放山城重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

□ 原载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创刊号，1966年12月9日出版

~~~~~

【人物春秋】

作家刘德彬在“文革”中

• 何 蜀 •

1965年，刘德彬与罗广斌、杨益言一起完成了根据江青所谈意见修改的电影《红岩》电影剧本，刘德彬亲手把稿子寄走。他们又写出了创作小说《红岩》“前续”的提纲。11月29日，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联名向重庆市文联党组并市委宣传部写出1966—1968年创作计划书面报告，他们的创作计划是：先写《红岩》“前续”，再改小说《红岩》，争取1966年底排出“前续”送审稿；1967年将小说《红岩》修改稿送审。1968年修改两部稿子，两部长篇小说均安排在1969年建国二十周年前完成。在此期间，还要同时完成市委布置的川剧《江姐》和江青交代的重新改编电影《红岩》的任务。

正当他们满腔热情投入新的创作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当文革风暴袭来，全国许多作家被当作“文艺黑线”人物或“走资派”、“反党分子”批判、打倒时，小说《红岩》的作者却成了造反派。这里边有些特殊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重庆市某些领导人对罗广斌在“11·27”大屠杀之夜从白公馆脱险的经历存有疑问，罗广斌因此在文革前一直受到审查和怀疑，即使小说《红岩》引起轰动后也未能改变这样的处境；再加上罗广斌、杨益言在参与改编电影《红岩》时，提前介入了“批判文艺黑线斗争”……虽然因为小说《红岩》在当时如日中天的革命声望，他们在文革初期没有被划入“黑帮”、“黑线”之列，但仍感到一些无形的压力。特别是在他们创作小说中起了重要指导、帮助作用的马识途和沙汀，竟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黑帮”！这不能不使他们有唇亡齿寒、危机将临之感。当1966年10月中央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地掀起群众性造反浪潮时，他们便积极投入其中，为首建立了重庆市文联第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文联红卫兵”，并在文联夺权建立了“文联文革小组”。作为三人创作组成员的刘德彬，自然也跟着参加了这些活动。只是因为善良忠厚的性格和有过“犯错误”经历的顾虑，他在这些活动中从不张扬，显得低调。

因为小说《红岩》曾被广大青少年当作“革命人生教科书”，所以《红岩》作者的造反，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对重庆文革的影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造反派因1967年1月夺权分裂为两大派后，罗广斌成为“砸派”（后称“反到底”）的旗帜，也成为另一派“八一五”重点攻击的目标，“砸派”建立的联络站被“八一五”讥称为“廉罗栈”（廉指工人造反军负责人黄廉，罗指罗广斌），“八一五”还写出大批传单、大字报攻击罗广斌是“叛徒”、“政治扒手”、“造反派中的定时炸弹”……

1967年2月5日，罗广斌被“八一五”派从文联家中绑架。刘德彬闻讯后立即写了大字报《罗广斌是个好同志》，次日，为澄清罗广斌备受攻击的“历史问题”，刘德彬与文联机关同一派的几个同事分头出去调查。刘德彬去涪陵找专区副专员杨其昌（当年与罗广斌一起从白公馆脱险的难友），取得杨其昌的证明材料后，他于9日回到重庆，听说文联机关已被另一派抄砸，他去了“砸派”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当晚造反军总部又被包围砸抄，刘德彬逃出，到火车站买票到了贵阳。从这时起，他又过起了像当年从事地下工作时一样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

2月10日晚，他到了贵阳市委韩子栋家——韩子栋曾在国民党狱中有过一段传奇经历，曾启发了他们在《红岩》中塑造出华子良这个人物。在韩家，刘德彬与先期到达的杨益言和北京大学侯均初、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余刚勇等会合了，杨益言他们是开了一辆吉普车逃离重庆的。刘德彬得知，杨益言他们已在着手整理重庆“两条路线斗争”和罗广斌在文革中“坚持斗争大方向”的材料，准备找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为罗广斌鸣冤。

但他们都没想到，就在刘德彬到达韩家这天，罗广斌在重庆关押地不幸坠楼身亡，“八一五”说是自杀，“砸派”说是被谋杀。有关消息迅速传遍各地。当刘德彬在贵阳得知噩耗时，他立即与北大学生侯均初一起，由韩子栋的秘书带领，去贵阳市委机关向中央文革打了长途电话报告。随后，他们就去北京告状。

到北京后，他们先住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3月底搬到支持重庆“砸派”的北京地质学院（当时由“东方红公社”掌权）。杨益言则由张羽接去住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他们首先到公安部接待站、中央文革接待站去汇报了罗广斌被重庆“走资派”“谋害”的情况。然后向中央领导人送交了杨益言和刘德彬联名写的报告。给江青的报告是送到中南海侧门收发室递交的。同时还由杨益言通过新华社当时的负责人王唯真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报送了材料。

因要求平反冤案而到京上访的原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这时也住在北京地质学院，他多年后回忆：“记得1967年杨益言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时，我曾向他提出，刘德彬由于受了‘左’的错误的的影响，未能在《红岩》出书时把他的名字署上，这个问题今后还得解决一下。杨益言对我说，这件事情好办，以后再版时，把刘德彬的名字署上，然后在后记中把刘德彬的名字未能在《红岩》初版时署名的原因加以说明即可。这次谈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杨益言所提的办法简易可行，可使一件长期不合理的事情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从3月25日开始，首都红代会中支持重庆“砸派”的一派组织，在一些大专院校和团中央机关及其直属单位，以及七机部“九一六”、天津南开大学等单位举行造反派群众集会，控诉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走资派阴谋杀害”了罗广斌，杨益言奔走于各处会场作控诉发言。小说《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不顾《红岩》已被一派群众组织批判为“大毒草”，毫无畏惧地以“《红岩》责任编辑”的身份陪同杨益言到各处大会上去讲演，为捍卫《红岩》的革命声誉大声疾呼（那时没有谁跳出来否认他是《红岩》责任编辑）。刘德彬则还是像当年建议以组织上的“审干”代替群众运动的“肃反”那样，认为罗广斌的问题应该由党组织进行审查处理，不宜到群众中去造舆论。但他又怕被批评是“右倾”，因此也不敢公开表示异议。只是从不到大会上去发言，也很少参加那些控诉、批判大会，

在此期间，罗广斌的遗孀胡蜀兴来到北京与他们会合了。于是，杨益言、胡蜀兴和刘德彬联名写信给江青，请求得到接见以汇报罗广斌问题。江青批示给戚本禹，戚本禹派了两个秘书到北京地质学院听取杨益言和胡蜀兴的汇报，参加这次汇报会议的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十余人。

1967年4月初开始，按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解决四川问题和重庆问题的会议，中央指定重庆造反派两大派各推选十名代表出席会议，杨益言是“砸派”十名代表之一。

5月16日，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结束，周恩来宣布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意见》批评了重庆驻军对造反派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支持公安部门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错误，要求作好平反工作。《意见》回避了对重庆夺权后建立的革联会的表态（实际上等于是没有承认革联会），而提出另行组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些都使反革联会的“砸派”（即“反到底”派）深受鼓舞。罗广斌的冤案似乎有了平反之望。

因北京清理外来人员，10月2日，杨益言、刘德彬离京到了成都。先住到设于四川省地质局内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蓉联络站，一个多月后迁住四川大学（当时由支持重庆“反到底”的“八二六”掌权）。这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罗广斌问题调查组奉令结束，将调查工作转交重庆“反到底”派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继续进行。为配合西师同学的继续调查，杨益言、刘德彬翻印了有关罗广斌的历史调查材料，并重写了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

1968年3月上旬，成都《军工井冈山》报编辑部决定出版为罗广斌翻案的小报专版，该报负责人黄世学与杨益言、刘德彬商量，并请示了支持重庆“反到底”的四川省革筹组政工组宣传组，商定写出四篇“评山城罗广斌之死”的长篇评论，联系建国以来“两条路线斗争史”，把罗广斌之死作为“李（井泉）、任（白戈）死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罪行来批判。“一评”由四川省文联陈朝红执笔，“二评”、“四评”由杨益言执笔，“三评”由刘德彬执笔。

正当他们的“四评”印成小报准备出版时，3月15日，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50军、54军领导人的会议上，江青在讲话中突然明确表态：“罗广斌是

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

文革“旗手”一言九鼎。“三一五”讲话传达下来后，谁也不敢再为罗广斌翻案。住在四川大学第二招待所的杨益言，也从“八二六”的“座上宾”变成“阶下囚”，被翻脸不认人的四川大学革委会关押审查，不久又被转送重庆交市革委关进干部集训队。刘德彬在成都因痔疮住医院开刀治疗两月后，到广汉乡下一个西师同学家暂住。11月，他回到重庆，因局势动乱，不敢回文联家中，而去了垫江老家乡下。但“清理阶级队伍”风暴很快便横扫全国，哪里也不能久留外来人员。1969年3月27日，刘德彬回到重庆市文联，次日即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审查。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刘德彬遭到了反复逼供，硬要查出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当时罗广斌已被认定是“叛徒”；杨益言因当年被国民党逮捕坐牢时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所以不存在“叛徒”问题；刘德彬虽然是从渣滓洞看守所大屠杀中脱险的，被称为“活着的烈士”，但他却从不自吹，还一直老老实实地说自己被捕后没有受过刑，自然就要引起一些人的怀疑。而在文革那样的狂热年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更要被放大若干倍来分析上纲。于是，在“新生红色政权”的逼供下，刘德彬写了如下交待：

特务对我为什么不用刑？当时特务是何想法，打算，我不清楚。根据我的接触和我的认识，提供以下情况，供领导上审查和分析：

1、叛徒涂孝文在出卖我时，并未出卖我在云阳、奉节赵唯、刘孟伉那里工作过。我的主要依据，一是特务在审问我时，根本未提到我在农村的关系；二是黄绍辉在狱中讲过，冉益智对涂孝文劝降时曾说：“只要不交农村的关系，问题就不大。”据我了解，下川东的武装斗争主要是彭咏梧负责，重点是云阳、奉节、巫溪等地。上述几个地区的地下党，如赵唯、卢光特、王葵、刘孟伉、刘本德、杨健成等均未逮捕，当地群众在六、七月份也未遭到逮捕。

2、特务当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江竹筠。估计叛徒涂孝文把农村武装斗争的情况全部推给彭咏梧，而彭已死，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江的身上。事实上江竹筠确也知道云阳、奉节的情况，为输送干部下乡，充当联络等。

3、特务当时对我并不重视。几次审问时间都很短，而在同案中，我是最后一个。相反，如果特务知道我和云阳、奉节农村的关系，肯定不会轻易放过的。在渣滓洞被捕的政治犯中，如果特务知道是搞武装暴起义的，大多是作为“要犯”来处决的。

4、未受刑的不只我一人。在我同牢房的人中，未受刑的有胡作霖、周鸿钧、曹作康、高精益、李明辉、唐慕陶等。在和我同案中，在万县被捕的涂孝文、雷震等十一人，在万县受过刑的有涂孝文、雷震、黄绍辉、江竹筠、李青林等，黄玉清、陈继贤、李承林是否在万县受过刑，如前交待，还不能肯定。在万县被捕的十一人好些是分头关的。我只和李承林、李明辉、唐慕陶关在一起（即6月14日在万县警察局），我们四人，从我到警察局后均未受刑。到了渣滓洞以后几次审讯，除江竹筠、李青林外，我们同案人多数未受刑。

当时进行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曾经经历过的人们如今大多已经淡忘，没有经历过的人们则根本无法理解和想象。那种“革命大批判”荒谬到什么程度？从刘德彬的以下遭遇可略见一斑。

刘德彬是在渣滓洞大屠杀之夜死里逃生的。在“清队”学习班里，被“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的人们把他脱险一事放到“路线斗争”的高度重新分析，居然发现他在脱

险时犯有严重错误。什么错误呢？说他在特务进牢房补枪时，有的难友临死前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而他没被打死却装死，为了怕被补枪，没有起来高呼口号，没有表现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意志，因此他是中了刘少奇“活命哲学”的毒……

在这样“高屋建瓴”、“义正辞严”的“革命大批判”中，在当时那种“红色恐怖”的大气候下，有着30年党龄的忠实共产党员刘德彬，几乎被逼得精神崩溃。请看他写于1969年11月17日的《我最近的思想情况和有关被捕审讯问题的交待》中的一段：

最近组织上一再给我帮助教育，指出我有重大问题，隐瞒了二十年，要我坦白交待。我感到很紧张，思想上产生了矛盾，我自己反省没有重大问题隐瞒。11月14日晚，我把自己的思想情况向机关值班的××、×××同志汇报，他们对我进行了诚恳的帮助，特别是×××同志给我指出，说我的问题是严重的，从领导上重视的程度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主要矛盾在我这边。我听了老×的谈话很感动，带着问题学了毛主席有关语录，首先肯定矛盾主要方面在自己，并批判主观唯心论，认为自己历史上“没有问题”的关门思想，从自己被捕开始，逐段过细回忆，寻找自己的罪过。到15日半夜，当回忆到48年6月14日晚在万县伪警察局被审讯情况时，回忆到审讯结束时，特务问我：到万县来干什么？我说：失业很久了，家庭经济困难，到万县来托同学找职业的。

这时我思想上就出现了，“政府可以帮你介绍嘛，比如一个小学教员”，于是我就肯定特务曾对我说：“职业可以找我们政府嘛，我们政府可以帮你介绍，比如一个小学教员啦！”我回想，特务是这样对我讲的话，根据我当时的思想准备，不暴露身份，不暴露组织，以一个失业青年身份出现的话，那我肯定是这样回答：如果政府能帮我介绍，那当然好啊。

……我就感到这个问题的性质严重，埋怨自己为什么把它忽略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组织上查出来，自己又未交待，那就危险了。因此16日一早，我就向××、×××同志要求，在天天读的时间，让我交待这一两天我思考的问题。我向他们谈了以后，×××同志鼓励我，感到自己问题严重，说明有进步，但还要继续考虑。下午我就写出了自己的《检查》和《在万县被审情况回忆交待》两份材料，交给了×××同志。

交了材料以后，我继续回忆，我在万县的审讯是不是就这样完了呢？我头脑里就出现了特务旁边的记录是用十行纸在记的，似乎特务就截了一小指宽的纸条，我回想，这时特务是不是要我签字呢？既然你同意政府帮你介绍职业，那你就签个字吧！于是我想很有可能我在那纸条上面签了个名字，说不定还加了上同意政府帮我介绍职业。

晚饭后机关同志放假回到学习班，晚上我就交待这两天考虑的问题，我把上述情况谈了，同志们听了以后，提出了很多问题，到底签了什么字？白纸条上签个名字说明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我都不能回答，我思想上又狐疑了。

这份交待材料十分真实地反映出，在当时那种“史无前例”的环境里，一个曾经在国民党监狱度过了17个月黑牢生活而毫不屈服的老共产党员，在“文化大革命”这种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政治迫害运动中，人性、人格会被异化、扭曲到何等地步！

□ 节录自《刘德彬：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原载河北省社科院《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二、三期

~~~~~

【亡灵祭坛】

复旦大学已调查到的文革死亡记录

• 佚 名 •

1966年，物理系教师毛青献，被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控他讲过“黑话”。他在复旦大学的灯光球场被“斗争”，身上浇了墨汁。毛青献不堪侮辱，在学校跳楼身亡。

1966年，谈家桢教授的妻子傅曼芸被“斗争”后，不堪屈辱，自杀身亡。

1966年，中层干部叶绍箕被“斗争”后自杀身亡。

1966年8月8日上午，化学系教授赵丹若被化学系的学生“斗争”，戴高帽，罚跪，脸上涂黑，游街，并且被打。“斗争会”开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斗争会”结束后不久，赵丹若倒地气绝身亡。

1967年，新闻系副主任伍必熙，在复旦大学第八宿舍3号楼西侧4楼跳楼自杀，尸体无人收拾，在3号楼下的水泥地上整整放了近一天。

1967年，化学系总支副书记戚翔云（住复旦大学第五宿舍）在“隔离审查”中跳楼自杀身亡。

1968年5月15日，化学系教授严志弦被毒打致死。红卫兵把打得还剩一口气的严志弦教授架到家门口，大声砸门，然后就把重伤的严志弦撂下就走了。他的妻子说，早晨出去还是活活的一个人，回来还没过门槛，就咽气了。

1968年11月30日，中文系主任朱东润之妻邹莲舫，因丈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她作为家庭妇女也遭到复旦宿舍居民批判，并被罚带病打扫宿舍大院。1968年11月30日含冤自缢。死后还遭到批判，定为“畏罪自杀”。

1968年，外文系教授樊英被迫害自杀身亡。

1968年，生物系教授焦启源（住复旦第九宿舍），在“隔离审查”时自杀身亡。

1970年，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园长、党支部书记李秀英（家住复旦第四宿舍B区14号），惨遭迫害后在复旦学生楼3楼跳楼自杀。

文革中，历史系教师范明如自杀身亡。

文革中，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吴维国自杀身亡。

文革中，历史系教师陈显道自杀身亡。

文革中，体育教师钱行素因其曾任“东亚体育学校”校长的丈夫无辜被判刑，她受牵连被迫害，绝望中钱行素在厕所上吊自杀身亡。

文革中，副校长李铁民自杀身亡。

文革中，干部郭仁杰自杀身亡。

文革中，外语系刘德中教授夫妇自杀身亡。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教导主任朱本初被“批斗”和关押和殴打，他从学校的二楼跳下死亡。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